

郭超焱

古诗文欣赏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古诗文品赏

郭超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古 诗 文 品 赏

郭 超 焱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枝江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2 插页—140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54—0679—3

1·561 定价:3.50 元

序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她不断哺育着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古典文学的素养，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文明素养中必不可少的成份。我们的古典文学工作者，正是这种养份的输送员与营养师。

我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好学生、现在宜昌师范专科学校任副教授的郭超超，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她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工作，讲台上送走了三十多个寒暑，有的父子两代人都受过她的教诲；近十年来，她在教学之余，还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致力于对广大青年古典文学爱好者的辅导，撰写了一批论文。《古诗文品赏》一书，就是作者这类文章的结集。

这是一本有别于通俗读物与纯学术探讨的古典文学论文集。超超一开始撰写，就决定以广大业已入门而尚待深造的古典文学爱好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包括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为主要对象，有如一位有经验的向导，引导着他们去领略古典文学宝库的瑰丽与神奇，帮助他们拓展视野，丰富知识，加强素养，提高审美情趣。

社会对于古典文学的需要是多层次、多侧面的，这决定了古典文学研究也应当是多层次与多侧面的。高深的理论探索、

训诂、考证、索隐，诚然是必需的，尖端性的学术研究也十分重要。然而这并不就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全部内涵。就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中绝大多数来看，他们无意于日后成为古典文学的专门家，因而对于专业性太强的训诂、考证、索隐之类，和十分难啃的理论，他们往往没有浓厚的兴趣。如果提供他们的书籍只是少数专家的“高精尖”专业成果，那么他们的愿望不仅得不到满足，反而有可能使他们畏怯、厌恶、以至望而却步，而同古典文学疏离开来。这样，就会使古典文学失去广大的读者群，而将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作者即读者，读者即作者”的小圈子里，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冷落与寂寞的结果，这一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普及入门的ABC，显然也是十分必需的，通过通俗、浅显的诠释与介绍，缩短读者与古典文学的距离，帮助年轻的一代去品尝和消化那精美的文化，这项工作今天做得还远远不够，无论数量与质量都亟待加强，否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继承将出现滑坡与断层。然而通俗性的读物只能满足初入门者的需要，对于已入门者所面临的“吃不饱”的问题，我们也必须重视。他们需要那种比诠释性要高、比深奥性略低的“普及提高型”或“提高普及型”的读物，渴求有相当深度、有新颖见地、资料翔实、语言明白的阐述，去帮助他们有所撷取、有所品味和吸收，在较短时间里，以较为有效的方式获得知识实惠。《古诗文品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满足广大青年古典文学爱好者的要求。

值得强调的是，《古诗文品赏》不仅有助于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文学素养的提高，而且由于对特定对象、从特定角度、运用特定的资料，提出一些崭新的见解，因而对于古典文学研

究者与教学工作者包括中学语文教师也有所启迪与充实。超焱的视角是较为开阔的,从先秦到汉魏六朝、唐宋明清,从散文到诗赋,从史籍和专门论著到零篇短札,从宏观鸟瞰到微观深析,对某些说法作了或论证,或辩驳,或纠谬,或推荐介绍,不拘一式。超焱有意地避开一些热门作家与热门论题,而将视线投向一些尚未被研究者引起足够重视的作家、作品与话题,因而填补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具有一定开拓性与创造性。而且也许由于超焱自身是女性,因而善于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情愫,对历代女性作家投以极大的关注与热情,以致从中国第一女辞赋家班婕妤、南朝沈满愿到唐代薛涛、李冶、鱼玄机,到宋代朱淑真,一一收入笔底。以那篇1981年写成、1982年发表于《人文杂志》上的《明月珠难识,甘泉赋可称——唐代女诗人诗作概说》为例,当时全国各刊物关于唐代女诗人及其诗作的文章尚不多见,作者即对唐代百多位女诗人近七百首诗作,就其作者身世、诗作题材、意境、艺术形象、语言特色与时代局限作了全方位的率先探索,此后,论唐代女诗人专文及选集才纷纷问世。书中对于《战国策》、《世说新语》等著作,对于鱼玄机、朱淑真、陆游作品的论述与分析,都有独到之处,至于同当代名家进行真诚说理性的讨论,正体现作者追求真理、探究真知、实事求是的治学作风。

古典文学的论述文章容易流于枯涩繁琐,难以卒读,超焱的文章却无此弊病。笔触流畅,简炼而富文采,没有板滞晦涩的议论,也不作连篇累牍的旁征博引,无生僻怪异的“牛角尖”,颇合青年学者的口味与意趣,读来有一种美的陶冶与享受。

几年前,我曾为超焱用《尚书》“君子所其无逸”题册以共

勉，看来她正是这样做的，她一边不倦怠地教学，同时又在古典文学园地里默默耕耘，几十年无逸，实在令我欣慰。

石声淮

1991年夏于武昌华中村

目 录

序.....	石声淮(1)
纵横捭阖·辩丽恣肆.....	
——《战国策》辞令艺术试探.....	(1)
其人虽已没 千载有余情.....	
——试论屈原传说对屈原研究的认识价值.....	(18)
究竟如何理解《九歌》的艺术形象.....	
——兼评“古代社会各阶级的画廊”说.....	(33)
“无韵之《离骚》”解.....	(42)
中国第一女赋家.....	(54)
《世说新语》语言的审美价值.....	(64)
窄狭天地与睿智才华的反差.....	
——南朝梁代女诗人沈满愿诗作探评.....	(78)
勇于创新的青年诗人李贺.....	(87)
明月珠难识 甘泉赋可称.....	
——唐代女诗人诗作概说.....	(98)
鱼玄机论.....	(110)
唐代女诗人诗作赏析.....	(126)
《送兄》	
《闺怨》	
《筹边楼》	

《酬人雨后玩竹》

《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

古代儿童文学的佳作

——读《童区寄传》..... (143)

六一风流今尚存

——记欧阳修在夷陵..... (149)

急言说论 千古佳篇

——读欧阳修《与高司谏书》..... (160)

多情才女的命运交响曲

——朱淑真诗词特色谈..... (167)

眼高懒为凡花醉 与梅岁岁有幽期

——陆游咏梅诗琐谈..... (184)

乃知画非妄 胜境多知音

——三游洞古诗文揽粹..... (196)

文言文教学漫议..... (210)

后 记..... (229)

纵横捭阖 辩丽恣肆

——《战国策》辞令艺术试探

《战国策》，作为记录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斗争及其有关谋议、辞说的史学专著，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司马迁的《史记》引用大量《战国策》原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尽管策书中夸大、附会、荒诞之处甚多，其史料的可靠性与可信度，大大打了折扣，以至被人斥为“浅陋不足道”（宋李格非《书〈战国策〉后》），甚至“邪说”之书（宋曾巩《曾子固序》）。然而，它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是古今倾服、中外蜚声的。

但是，《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哪里，看法至今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文学史和论著认为，最突出的地方是具有传记文学的特点，善于描写完整的故事，有生动的人物形象。有的虽也注意到了它的论辩性的特点，却强调不够，缺乏充分的论述。

诚然，《战国策》中塑造了荆轲、聂政、苏秦、触龙、鲁仲连等一批个性鲜明、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可以称得上是初具规模的传记文学，书中不少篇章情节曲折，故事完整，叙事状情曲尽其妙，又颇有后世历史小说的特色。象《苏秦始将连横》、《冯谖客孟尝君》、《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等篇，

既可当作优秀叙事散文来读，也可看作历史小说的滥觞。但《战国策》文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应是它的辞令艺术。诸辩士的论难文章与其足以耸动人主听闻的议论，纵横捭阖，辩丽恣肆，变幻无穷，蔚为壮观。其精采、丰富而又集中，在古今中外书海籍林内，几乎是仅见的。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唐刘知几《史通·内篇》）。辞令艺术即是战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作为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开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斗争纷纭复杂。在各国间奔走游说数以百计的纵横策士，便成为一支异常活跃的力量。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战国策书录》），“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上》），词说论辩，成了外交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加之一言合意，立取卿相；一语不智，垂橐而归，这种个人的穷通利害，也促使策士们去练就一套锐利的机锋、高妙的辩技和绚丽的词章，从而将论辩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成了先秦文学艺术成就的一个代表。

《左传》、《国语》、《孟子》、《晏子春秋》等虽然也有精采的论辩记实，但毕竟不象《战国策》这样几乎占了整个著作的全部；《盐铁论》等政论，其论辩的严密、充分，也堪称上品，但毕竟缺乏《战国策》辩士“文”、“情”、“理”融为一体的造诣。郑振铎同志说：张仪苏秦的绝好的政论，“实在是一种杰作，后人很少能及得到的。贾谊不过悲愤而已，陆贽不过恳切而已，若苏张之作，才当得起隽脆清俊、深入无间之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种比较是很有道理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记述十二国策士论辩的四百余篇文章，正是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成为辞令艺术的荟萃之地。

《战国策》辞令艺术特点,首先表现在策士们善于“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针对不同的对象和情势,选择游说进言的角度、重点、方式、方法、以至语气,“扶急持倾”,排难解纷,显示出这些“高才秀士”令人惊叹的“奇策异智”(刘向《战国策书录》)。

合纵、连横两大派的领衔者苏秦、张仪,可算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那种相机行事、随机应变、当机立断的“机变”能力,简直达到了随心所欲、登峰造极的地步。同一个苏秦,为同一合纵目的,说楚威王与说韩宣惠王,说法大不相同。楚国地处南方,是仅次于秦的大国。正是合纵主张实现的主要依靠,苏秦因此大唱赞歌,铺陈其地险势固、人强财富,利用楚王勃勃野心,投其所好,大肆鼓动:“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制……。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君宫矣,赵、代良马橐驼必实于外厩。”说得为称霸而“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的楚威王五内熨帖,言听计从(《楚策》)。

对韩王,则用另一战术,针对其少年气盛的特点,在渲染韩国地理优越、武器精良、将士锐勇之余,则使用激将法,以“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的俗谚相讥相激:“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劲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终于使得这位少年国君“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而太息:“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韩策》)

同一个张仪，为同一连横目的，说赵王与说韩王，其内容与手法也大相径庭。

韩国国力小力微，地处偏僻，张仪的话则充满直截的恫吓之词，先极力鄙薄韩国的穷困，兵力的微弱，接着便夸耀秦国的富足，兵力的强盛。杀气腾腾地宣称，以强秦的兵力“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坠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从精神上摧垮对方的防线，然后擅自作结：“事秦则安矣，不事秦则危矣”。纯粹是咄咄逼人的赤裸裸的讹诈（《韩策》）。而于赵，这一套显然不灵。因为赵国无论从地理环境和军事实力方面都远远优于韩，足与秦抗衡。事实上，首先“约纵以难秦”的也正是赵国。因而张仪在赵王面前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样是武力胁迫，却机锋暗藏。先说由于赵的强大，致使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逼得秦“缮甲厉兵”，“力田积粟”，至于今日要“迎战赵于邯郸之下”，而“敬使臣先以闻于左右”，接着指出，苏秦被车裂于齐而合纵破产，齐楚韩魏先后臣服于秦，赵已处“失其党而孤居”的严重关头，又一次强调“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似乎特别友善。最后才提出“莫如与秦遇于渑池，面相见而身相结”的主意。比起同韩王的那番说辞，则实在要委婉得多。（《赵策》）

其实，又何只苏张二人，见之于《战国策》中的策士，谁没有这样几手，辩说于对方，一手不行，再来一手。或晓以大义；或陈之利害；或直言警告；或当头棒喝；或持理相斥。《赵策·鲁仲连义不帝秦》即是典型的一例。

秦兵临赵都城下，魏国救兵不至，却派辛垣衍来劝赵帝秦。鲁仲连挺身而出，面见辛垣衍。在探听对方虚实之后，由远至近，慷慨陈词。先指出帝秦的错误，想以大义打动对方。当

看出对方不能为义所动时，立即改变战术，从切身利益动摇对方，口气严峻，出语突兀，达到了危言耸听的地步：“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当头一棒，使其为之一震。然后，列举史实证明秦一旦称帝，诸侯都没有好下场的道理，“曷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并引用邹鲁小国的臣民拒不接待以天子自居的齐的事例，讥讽辛的可鄙。鲁仲连恐这一些还不足以打动辛垣衍，又进一步指出，一旦帝秦，魏王不能安坐王位，“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语触及要害，不啻致命一击，终于使甘心为仆只求苟活的辛垣衍惊心动魄，“起再拜谢”，“不敢复言帝秦”。

这种由“义”到“利”，由“国”及“人”的层层推进的辞令手法，充分显示了这位堪称战国“第一义士”（《古文观止》评）的鲁仲连因人进言的才智和雄辩功夫。“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十），鲁仲连是当之无愧的。

策士们这种“机变”的能力，还表现在他们善于为自己的进言献策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创造有利条件。他们善于有步骤、有层次、有条不紊地展开自己的论辩。如范雎由魏至秦，目的是离间秦相穰侯以取而代之。然而，穰侯非同小可，乃是秦宣太后之弟，又有大功于秦。要想赶走他，谈何容易！弄不好，反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当秦王敬执宾主之礼见范雎，并屏退左右跪而进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时，范雎仅只“唯唯”二字，若是者三，才开口说话，但也并不先谈政见，而引历史事实：吕尚钓于渭阳之滨，遇文王一说而立为太师，吕尚与文王的交情并不深却能深言，是因为文王有知人之明，听进了吕尚的意见，终于成就了帝业。这番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交疏言深”的问题，为进言作铺垫。接着又表白自己并不是怕死而不

敢言，只要“可以补所贤之言”，就是死了也是“大荣”、“大愿”。那么怕什么呢？“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蹶也，因此杜口裹足，莫肯向前尔”。再则，怕的是秦王上畏太后，下惑于奸臣，终有灭国亡身之危。最后再次表白：“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只是不讲“去穰侯”的主要话题。为什么要如此大绕弯子、多费口舌？原来只为的是取得信任。当秦王完全被笼络住，明确表示：“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时，才接触中心议题，滔滔陈词，终于使得“秦王惧，于是乃废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泾阳于关外。”（《秦策》）

一个普通的策士，经过一路耸动，一路要挟，直逼得秦王俯首受命，“不可谓非行人辞令之极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迅速抓住对方的弱点，乘虚而入，出奇制胜，也是策士们“机变”能力的表现。

张丑在燕国做人质，燕王要杀他，他在快要逃出边境时被境吏捉住。在这危急关头，张丑急中生智，利用统治者刚愎自用、草菅人命和官吏怕死的弱点，编造情节，化险为夷。张丑对境吏说：“燕王所为将杀我者，人有言我有珠宝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夺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当杀子，剖子腹及子之肠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说以利。吾且死，子肠亦且寸绝。”迫使境吏莫大惊恐，放他走了（《燕策》）。

自然，苏张之流朝秦暮楚，为个人功名富贵而玩弄口舌，反复无常，不择手段，毫不足取，但他们审时度势，有的放矢，

紧抓要害，透彻分析，因人因情因势而异，决不千篇一律，如法炮制、搞“一刀切”，却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战国策》是各种论辩技巧的大展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无论在论辩的立、破，事、理，正、反，直、曲，先、后，褒、贬，藏、露，刚、柔等方面，都表现了娴熟巧妙、变化万千的技法。其中基本和主要的，大体可归纳为如下诸点：

一、针锋相对。直面矛盾，不避锋芒，破立并用，毫不相让。这常是策士们压倒对手的重要手段。例如司马错主伐蜀，张仪主伐韩，二人争论于秦惠王前（《秦策》）。张主伐韩的理由是有利、有名，“此王业也”。反伐蜀的理由是无名无利，“去王业远矣”。司马错则针锋相对，先以“不然”二字打倒对方，然后针对张的“王业”，先列举成就王业的三项条件：“强兵”、“富民”、“博德”，进而指出伐蜀正可以“强兵”、“富民”并且“天下不以为暴，诸侯不以为贪”，“名实两附”。而伐韩，劫天子，“有不义之名”必遭孤立，不如伐蜀之万全。司马错弹无虚发，无懈可击，句句驳倒张仪，终于使得平日听信张仪的秦王变而听从司马错。

至于不辱使命的唐且面对秦王所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凶恶气焰，发出“布衣之怒”的议论：“若士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魏策》）。以及颜觸与齐宣王“觸前”、“王前”、“慕势”与“趋士”，“王者贵”与“士贵”的争辩（《齐策》），都是这一技巧运用的成功范例，成为千古美谈。

二、单刀直入。一下接触实质，一语道破，痛快淋漓，开门见山。此种技法的运用，《战国策》里可说是比比皆是。尤其是劝阻、批驳之类的论辩更是如此。往往先劈头一句，鲜明摆出观点，然后再申述理由。如《齐策》写公孙戍谏孟尝君受楚象床，入见之后，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臣愿君勿受”，然后才用义、廉的道理，从正反两方面阐述理由，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在这里，模棱两可、含糊隐晦之类是毫无立足之地的，这也就决定了策士那种锐利明快、径情直遂的风格。

三、侧面迂回。先不正面交锋，也不从反面入题，而是避其锋芒，“牵牛”、“磨菇”、“弯弯绕”，逐步折服对方。《赵策·触龙说赵太后》，开始尽说闲话，生活琐事，儿女人情。殊不知句句皆非闲话，并非闲情，而是经过匠心安排，使其入彀而不自知。暗地里将重大问题尖锐地摆在赵太后面前，逼她正视、思考、作答。这就是所谓“计短”、“计长”的问题。待到太后自己吐露心事之后，触龙才用赵王及诸侯子孙因无功于国而不得长久继位的事例，暗示太后的溺爱对长安君的不利，但仍一句不提长安君为质的事，然而太后却由此豁然领悟而听命于触龙。触龙之所以获得成功，固然在于他立论的正确，在于他为国为君的思想，但辞令技巧的高超，达到了“叹为观止”的境地不能不是重要原因。

《楚策·莫敖子华对威王问》，也属这一类型。楚威王向莫敖子华发问，莫敖子华不同意楚威王的看法，但又不便正面反对，开始推说不知，当威王一定要他作答时，仍不正面回答，却类似答非所问。待到楚王进一步追问，子华这才对楚王进行讽谏，说出要说的话，阐述“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的道理：灵王爱细腰，就有节食以求宠的楚士；国君爱射猎，臣子也就纷纷练